

· 经济观察 ·

# 对外开放与中国式现代化

——内在逻辑、重点议题及战略抉择

朱福林

（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 外国投资研究所，北京 100710）

**摘要：**党的二十大对中国式现代化作出了理论擘画和全面部署，并确定高质量发展为首要任务。高质量发展离不开高水平对外开放，实行高水平对外开放是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征程的必然要求。通过对外开放实现内外经济互动是实现中国经济快速增长从而助推中国式现代化不断取得新进展的重要动力。基于此，首先，本文勾勒了新中国成立以来对外开放与现代化建设交互发展的历程，尤其分析了改革开放以来对外开放与现代化共生的关联性，并阐述了两者交融发展的内在逻辑。其次，对当前中国式现代化新征程中与对外开放战略密切相关的若干重点议题展开探讨。最后，笔者提出中国式现代化背景下实施高水平对外开放的思路。

**关键词：**对外开放；中国式现代化；高水平对外开放；经济全球化

**中图分类号：**F125.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176X(2023)12-0003-14

## 一、引言

自近代以来，中国与世界关系的设定和建构一直是事关中国发展的重要变量。内外互动成为影响乃至决定中国社会政治发展进程的基本关系<sup>[1]</sup>。中国发展的绩效取决于中国与世界互动的程度和质量，当对外开放与自力更生的关系处理得当时，中国的发展便顺利加速；反之，当处理不当时，就会经历曲折。1957—1979年，由于国内外多种因素的制约，中国经历了长达23年的与世隔绝，形成了事实上的闭关自守，尽管这期间中国坚持自力更生取得了较大成就，但抵不过关起门来搞建设遭受的损失<sup>[2]</sup>。改革开放45年来，中国的发展已深嵌于世界体系之中，中国与世界的互动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如此频繁深入，对自身发展的影响也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如此深刻。作为全球唯一GDP总量超过10万亿美元的发展中国家，中国已成为世界第一大货物贸易国、第二大服务贸易国、第二大外资流入国和第三大对外投资国（2022年），中国的一举一动日益受到国际上包括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特别关注，随着中国国力的增强，有关“中国威胁论”“中国挑战论”的不实言论频繁见诸不同场合。伴随中国式现代化目标的提出与迈进，未来一段

收稿日期：2023-09-16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RCEP对亚太区域价值链重构的影响机制及应对策略研究”（22&ZD178）；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生产网络视角下服务业技术进步影响因素、机制及路径优化研究”（72073139）

作者简介：朱福林（1979-），男，安徽马鞍山人，副研究员，博士后，主要从事国际贸易和外国投资研究。E-mail: zhufulin1979@163.com

时期中国综合实力仍将继续攀升，按照2035年预期目标，中国要成为人均GDP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的基本实现现代化国家。在这个过程中，大国实力对比的深刻变化必然影响中国与世界之间的全方位关系。在当今全球化背景下，中国式现代化的改革与发展不可避免地依然要在与世界的频繁互动中进行，因而国际关系尤其是大国关系演化对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征程具有重要影响。在某种意义上，中国的对外开放主要强调的是中国与世界在经济领域的互动，相对于政治、文化和制度等非经济领域，中外经济融合比较容易可行。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不断融入全球化是中国式现代化得以实现多项历史性跨越的基本前提之一。当前，中美大国博弈、新冠疫情和俄乌冲突等剧变因素导致中国对外开放面临的国际环境发生重大变化，中国国力的提升也引发了国内外有关中国在世界经济体系中的角色与作用须发生相应转变的呼声。在中国经济的大国效应和中国式现代化两大前提下，探讨对外开放战略重新定位和突破路径显得尤为重要。

## 二、中国式现代化背景下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历史必然性

2023年6月27日，国家主席习近平会见新西兰总理希普金斯时指出，“只有开放的中国，才会成为现代化的中国。”<sup>[3]</sup> 开放是当代中国的鲜明标志。工业革命以后，任何国家和地区均卷入全球经济一体化的浪潮中，一国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离不开对外开放，发展的好坏程度也与对外开放的水平和质量密切相关。那些成功适应经济全球化潮流的国家和地区率先取得了工业化和现代化的成功，对外开放参与国际大循环成为经济全球化条件下一国实现经济增长和现代化的重要政策。近代以来，没有任何一个国家的现代化不是在开放条件下实现的，在封闭状态下是不可能实现国家现代化的，这是一个不容置疑的基本事实。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既有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更有基于自己国情的中国特色。”<sup>[4]</sup><sup>22</sup> 虽然鉴于国情、历史和文化等因素差异，各国实现现代化的具体路径和方式不同，但都具有对外开放这一共同特点。改革开放以来，国内生产总值的多轮翻番、温饱问题的解决、小康社会的全面建成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所取得的举世瞩目的成就都是在对外开放条件下取得的，新时代中国式现代化“两步走”新征程也必然要在开放条件下推进。为此，党的二十大报告将坚持深化改革开放作为中国式现代化新征程前进道路上的重大原则之一。

国家主席习近平在第五届进博会开幕式致辞中指出，“开放是人类文明进步的重要动力，是世界繁荣发展的必由之路。”从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前，现代化建设经历曲折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有关对外开放问题的非常态化处理，当然这也受到更深层次的政治和经济体制等因素的制约。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将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作出了改革开放的重大历史决定，并将对外开放确立为基本国策。改革开放开创了现代化建设的新纪元，经过45年发展，迅速积累起相当雄厚的物质基础，为中国迈向现代化国家创造了必需的基本经济条件。在这一历史转型中，一条重要的基本经验就是，以开放促改革、促发展，不断为中国经济和现代化建设创造新动能，改革开放是一枚硬币的两个方面，缺一不可。对外开放是持续释放中国经济增长潜能的不可替代的重要动力。当前，对外开放绝不仅是互通有无，虽然这很重要，但更为深远的是，对外开放架起了中国与世界沟通的桥梁，以经贸为纽带促进了中外知识和人文交流，形成吸收国外有益文明成果的开放心态，这些对于开创人类文明新形态的中国式现代化至关重要。当前中国改革进入“深水区”，多年累积下来的体制性和结构性矛盾在经济增速放缓的情境下充分暴露，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和要素区域流动仍面临机制性梗阻，以创新驱动为核心的高质量发展面临多重体制障碍，对外开放水平与构建新发展格局和培育国际合作竞争新优势的要求还存在一定距离，等等。这些深植于经济体制内部的结构矛盾仍需通过开放促改革来化解。改革开放依然是赋能中国式现代化稳步扎实推进的关键利器。面对全球化退潮、个别国家的“脱钩断链”和“小院高墙”，我们更应该解放思想，通过进一步开放赢得战略主动，竭力争取国际上一切有利因

素,为中国式现代化营造良好环境。正是意识到对外开放的重要性,党的二十大报告再次强调,“中国坚持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坚定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sup>[4]</sup><sup>61</sup>。

### 三、对外开放与中国式现代化交互发展的内在逻辑

过去45年来,中国对外开放迅猛发展,将中国从一个封闭半封闭国家转变成为全球贸易大国。中国的对外开放不是孤立进行的,而是融入到建设现代化强国的伟大事业之中。中国的对外开放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开辟了新征程,对外开放在不断深入推进过程中日益成为中国式现代化重要的持久动力和活力源泉。

#### (一) 对外开放与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交互发展历程

新中国成立之后,百废待兴、经济基础十分薄弱,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被迅速提上日程,党和政府确立了以工业化为重点的现代化发展战略,强调优先发展重工业和生产性经济部门,旨在为新生的社会主义国家创造强大的工业基础。一开始,中国高层领导便注意到,建设社会主义国家不能闭门造车,需注重与国外交流。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阐述的第十个关系便是中国与外国的关系,提出要“学习资本主义国家的先进的科学技术和企业管理方法中合乎科学的方面,工业发达国家的企业,用人少,效率高,会做生意,这些都应当有原则地好好学过来,以利于改进我们的工作。”<sup>[5]</sup>刘少奇领导起草的《关于对外贸易的决定》指出,为了迅速恢复与发展新中国的国民经济,应立即开始进行新中国的对外贸易<sup>[6]</sup>。陈云<sup>[7]</sup>也明确指出,“我国发展对外贸易的目的在于推进中国的工业化。”尽管当时认识到对外开放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但由于各种主客观原因,对外开放实践与理论之间存在很大差距,再加上仿照苏联实行国家集中统一的对外贸易管理体制,对外开放受到严重遏制,造成开放的方式、对象、产业和领域等一系列结构性失衡,极大地制约了对外开放的规模、质量和潜能的发挥。对外开放对现代化建设的作用主要体现在通过进口技术和设备推进工业化。在高度内向观念的影响下,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主要依靠自力更生和自我内循环,虽然也提出了现代化发展目标并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但现代化建设的水平、效率和质量总体不高。在此背景下,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无法有效利用国内国外两种资源和两个市场,错失了“二战”后持续了近二十年的第一次经济全球化红利。

在改革开放时代背景下,对外开放与现代化建设实现同步交互发展并取得了史无前例的成就。随着国家政治生活日趋常态化,中国经济发展和现代化建设逐渐驶入合理化、规范化、科学化轨道。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了把全党工作的着重点和全国人民的注意力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改革开放伊始,对外开放就被赋予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任,对外开放成为中国推进现代化建设的基本方略,主张在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基础上,扩大对外开放,引进外资和先进技术,向国外学习现代化经济管理经验和派遣留学生等。1980年8月26日,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五次会议批准的《广东省经济特区条例》明确指出,为发展对外经济合作和技术交流,促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在广东省深圳、珠海和汕头三市分别划出一定区域,设置经济特区<sup>[8]</sup>。1984年,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指出,“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把对外开放作为长期的基本国策,作为加快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战略措施,在实践中已经取得显著成效。”在对外开放摸索前进的同时,建设现代化国家的方案也在酝酿之中。经过邓小平等领导同志的不懈努力,并借鉴参考其他后发展国家的经验,党的十三大确立了国家现代化分阶段目标,即著名的“三步走”战略构想。随着对外开放实际效果的不断凸显,中国进一步坚定长期实施对外开放基本国策的决心,尤其是在邓小平“南方谈话”之后,党的十四大确立了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中国对外开放步伐进一步加快,领域进一步扩大,范围进一步拓展,吸引外商直接投资迎来一波小高潮,对外开放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促进作用不断增强。如图1所示,20世纪90年代中后

期，中国人均GDP增长与前期相比呈现明显的小幅提升，追赶世界的平均速率明显提高。1998年，《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提高利用外资水平的若干意见》指出，历史已经并将继续证明，对外开放是实现国家现代化和民族振兴的必由之路。随着开放大门越开越大，中国全方位对外开放格局基本形成，对外贸易和利用外资的规模扩大、结构改善、质量提高，开放型经济迅速发展。在此背景下，对外开放为现代化建设提供了有力支持与强劲动力。2000年10月，党的十五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个五年计划的建议》指出，“二十多年的改革开放和发展，使我国的生产力水平迈上了一个大台阶……实现了现代化建设的前两步战略目标，经济和社会全面发展，人民生活总体上达到了小康水平”。

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下简称“入世”）之后，中国加快了制度性融入全球经贸体系的步伐，对外开放进入全新时期，出口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推动中国成为全球生产基地，中国与世界的经济关联达到历史新高高度（如图1所示）。与此同时，21世纪的前20年，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入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决胜阶段。入世对中国小康社会建设起到重要的促进作用。如图1所示，入世后中国人均GDP呈现显著的腾飞特征。其中，2001—2008年，在入世效应的助推下，中国经济呈现改革开放以来少有的连年增长势头。入世对中国现代化发展的促进作用不仅体现在经济领域，更为重要的是，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建设也取得了重大成就。恰逢中国改革开放30周年，2008年第29届夏季奥林匹克运动会在北京举办，共有八十多名世界政要出席开幕式，这是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建设取得重大成就的重要标志。此阶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主要由入世引发的出口型经济高速增长带动。根据2011年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布的《中国的对外贸易》白皮书，截至2010年，中国入世的所有承诺全部履行完毕。2010年，中国经济总量超过日本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终结了日本自1968年以来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地位。2009年，中国超过德国成为全球最大商品出口国。入世对中国向国际标准看齐的现代化国家建设起到巨大促进作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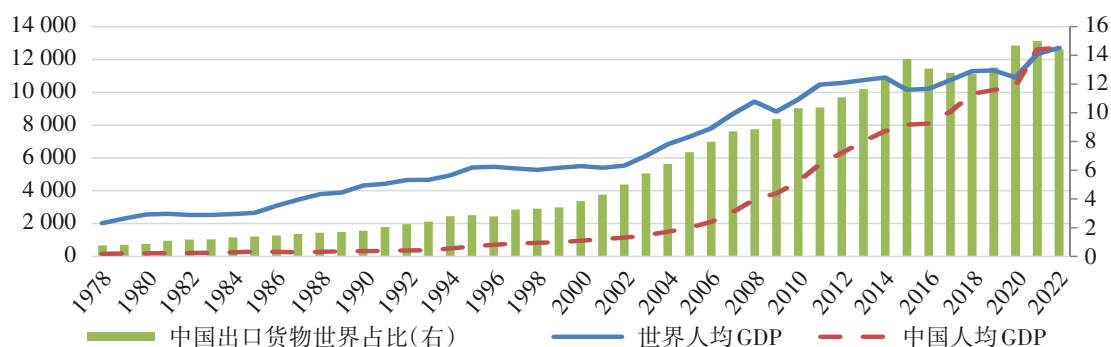


图1 中国货物出口世界占比、世界人均GDP和中国人均GDP增长趋势（单位：%；美元）

数据来源：世界银行和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下同。

党的十八大的召开标志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中国的对外开放并未止步于履行入世承诺，而是由被动的压力型开放转向更为自主的发展型开放，更加注重开放体系和开放机制的合理完善。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全面提高开放型经济水平，完善互利共赢、多元平衡、安全高效的开放型经济体系，从而回答了经济全球化步入后全球金融危机时代、中国完成入世承诺履行之后，面对国内外新形势如何进一步对外开放的问题。与此同时，中国式现代化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征途上加速推进。凭借四十年来开放式发展积累的物质基础和社会条件，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中国式现代化“新两步走”战略，将基本实现现代化的目标提前15年。与此相对应的是，对

外开放要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为此,中国的对外开放不仅积极对接国际通行惯例,引入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管理制度,同时大力推进自主设计的新型对外开放“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大大拓宽了中国对外开放的多维度空间,从而形成极具带动效应的共轭环流。党的二十大坚持了党的十九大设定的“新两步走”战略,概括提出并深入阐述了中国式现代化理论。2018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首次提出制度型开放,指明了中国未来对外开放的总方向。2020年,面对中美大国竞争和新冠疫情双重叠加的国际国内复杂形势,中国果断提出以构建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本质上,“双循环”是对经济效率的更高追求<sup>[9]</sup>,只有通过制度型开放更高效地利用国内外优质资源要素才能实现。进入新时代,中国式现代化与高水平对外开放的交互力度进一步提升,高水平对外开放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所需的国际资源要素创造了更为宽广的获取通道,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持续推进为实施高水平对外开放提供了更加有利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基础。

## (二) 对外开放与中国式现代化交互发展的政治经济学分析

中国的对外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是在一定的国内外政治环境下展开的。新中国成立之初,现代化建设和对外开放不可避免地受到社会主义传统意识形态的影响,同时在20世纪20—30年代苏联工业化取得巨大成就的鼓舞下,仿照苏联模式实施了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主要面向苏联和东欧国家开放,背后的逻辑是社会主义阵营内部存在一定补偿收益的友邦援助而非纯粹的市场化分工合作,这可从当时的社会主义国家经济组织“经互会”略知一二。1960年,中苏关系恶化,中国对外开放开始发生重大转向。1972年,尼克松访华结束了中美两个大国长达二十多年的隔绝,中美关系破冰并拉开了中国与西方国家交往的序幕,随后中日关系和中欧关系也开始朝着正常化发展。在此背景下,中国与西方国家逐渐建立起贸易关系,为日后向西方发达国家扩大开放、融入由其主导的国际经济体系奠定了基础。20世纪70年代末,在中国与西方政治环境日益改善的情况下,中国与西方国家的经贸合作提上议程。中国高层通过大规模出国考察,再次“睁眼看世界”,对比国内外现实,强烈意识到与西方现代化国家存在巨大的经济差距,从而形成了向先进国家学习的思想,并强调发展对外经济合作的重要性,进而使经济与现代化建设不断突破原有思想窠臼,尝试新思路新方案,从根本上意识到对外开放是中国发展的必由之路。

对外政治关系也是影响对外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模式选择的重要因素。从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之前,一方面由于模仿苏联体制,另一方面在美国和西方对中国实施经济封锁的条件下,中国对外开放实施的是对外贸易国家集中统一管理体制,以保证特殊时期现代化建设的统一调度和重点安排。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模仿苏联模式采取了优先发展重工业并过于强调自力更生的进口替代战略。改革开放之后,随着对外政治关系认知与处理日趋务实,中国摒弃了以意识形态和阶级学说划分敌友的做法,对外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模式也相应发生重大转变,逐渐融入西方主导的经济全球化,实施出口导向战略,推行权力下放,引入市场机制,注重产业比例平衡,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在务实主义外交营造的有利国际环境下不断完成预设目标。两种不同政治环境下的经济绩效差异充分显示出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所具有的巨大反作用。

改革开放45年来,中国对外开放逐步从经济特区扩展到内地地区直至全国范围,新型特殊经济功能区和开放高地不断设立,成为连接中国与全球供应体系的节点,同时产业开放由制造业逐渐扩展到服务业,国内外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跨境合作蓬勃发展。在这一过程中,对外开放与中国式现代化双向内在互动不断增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在对外开放的助推下取得令人瞩目的成就,同时也不断地为对外开放创造更高标准的机制体制环境。自2019年以来,中国人均GDP已连续4年超过1万美元,逐渐接近高收入国家门槛。总结对外开放对中国式现代化的促进机制主要有以下四点:首先,对外开放开辟了国内外多种交流渠道,使国外资本和技术等要素与国内资源要素相结合共同助力现代化建设。外部要素的流入及其对国内闲置要素释放的积极作用,是

45年来中国开放型经济增长的一种重要机制<sup>[10]</sup>。其次，通过引进外资和技术，一定程度上缓解了资金短缺和技术落后难题。利用外资是中国改革开放之后对外开放的一条主线。在渐进开放的基础上引进和利用外资是中国快速工业化的重要经验之一<sup>[11]</sup>。再次，通过发展出口导向型经济为从国外购买先进设备和技术提供了所需外汇。同时，出口导向型经济的发展也带动了中国产业能力的提升和产业链配套体系的扩展，加快中国工业化进程。最后，对外开放融入国际经贸体系势必要求改革国内经济体制。对外开放给中国带来的最大好处是形成促进国内改革的推力<sup>[12]</sup>。以开放促改革是中国改革开放的一条重要经验。对外开放引发的体制变革对中国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起到重要的倒逼作用，从而逐渐构建起与现代化产业体系相匹配的经济体制。

总之，对外开放为中国式现代化奠定了雄厚的经济基础，使中国史无前例地向建成现代化强国的目标大幅迈进。改革开放以来，在中国式现代化波澜壮阔的实践进程中，对外开放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同时对外开放也是造成中国不同区域现代化水平“高一洼”不平的重要原因，率先开放的地区在现代化建设方面走在前列。2019年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布的《新时代的中国与世界》白皮书指出，对外开放为中国带来了资金、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转变了中国人民的思想观念，激发了中国人民的创造热情，显著提升了中国的现代化建设水平。

#### 四、中国式现代化背景下高水平对外开放的若干重点议题及其化解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对新时代中国进一步实施对外开放作出一系列重要论述，对新发展格局下进行高水平对外开放作出了诸多重要部署。党的二十大以来，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进入历史新征程，对高水平对外开放提出了更高要求。为落实部署及响应现实需求，有必要厘清影响高水平对外开放的重点议题。

##### （一）准确研判当前国际形势的长期严峻性

客观认识当前中国所处的国际环境是制定和实施高水平对外开放战略的基础性问题。与2018年以前相比，当前中国对外开放面临的国际环境发生的重大变化是中美关系恶化。就中国而言，国际形势中最主要、最具影响力、最为棘手的变化便是美国对华政策主基调由接触转向遏制。中国过去45年改革开放是在中美关系建立、调整及改善基础上进行的，如今中美关系恶化必然对中国发展产生长远而深刻的影响。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将中国定位为战略竞争对手，这是正式官方文件对“假想敌”的委婉表述。美国无视WTO规则分批对中国进口商品加征额外关税并延续至今，对中国高科技企业实施芯片断供和实体清单出口管制。在特朗普执政时期，中美在新冠病毒溯源上发生严重分歧，这进一步侵蚀了中美信任基础，对中美关系下滑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拜登上台后，美国对华战略导向仍大体延续特朗普路线，明确提出与中国开展“竞争、合作、对抗”三位一体的基本方针，在加强基础国力、推动产业链与科技脱钩、联合盟友和构筑“小院高墙”等方面表现更甚，试图在不寻求改变中国体制的前提下重塑中国周围环境，最终通过提升美国综合实力以“竞赢”中国。与四十多年前中美建交带动中国与西方关系正常化一样，当前中美关系恶化也引起中国与西方关系日趋紧张。欧盟是美国的天然盟友，于2019年就已提出了“合作伙伴、竞争者、系统性对手”的对华战略，其实质与美国高度一致。2023年7月，德国发布有史以来首份《中国战略》文件，呼应了欧盟对华战略定位。虽然欧盟在中国拥有巨大的商业利益且强调战略自主，其主张的“去风险化”超过了美国的“脱钩论”，但在涉及非经济领域的价值观政治议题上，由于美欧意识形态具有天然亲近性，中欧分歧程度并不比中美分歧程度低。俄乌冲突让美欧更加团结，并激活了长时期处于“脑死亡”的北约。在此情况下，中国试图联合欧盟对抗美国的分化策略很难奏效。

中美大国竞争加剧不可避免地波及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关系。日本作为美国在亚太地区最有实力的忠实盟友，与中国在东海存在领土争端，在印太地缘政治战略上唯美国马首是瞻，较早地加

入美国遏华战略,是美国构建围堵中国的“小院高墙”“亚太版北约”的重要倚赖棋子。近几年,日本官方安全和防卫战略文件均将中国列为国际秩序的最大“挑战者”。当前,中日关系向好的空间不大。在以往中日“政冷经热”的关系大局中,“经热”在维持中日整体关系上发挥着重要的缓冲作用。而近年来,由于日本在华企业布局呈总体收缩态势,导致双边经贸合作基础缩小,双边关系中的经贸促进机制因而有所减弱。2023年,日本政府福岛核废水排放引发中日两国矛盾加深,进一步削弱中日关系回暖的民意基础。总之,在中美大国竞争背景下,中日关系前景不容乐观。韩国是美国“印太战略”体系中又一重要的有实力的盟友,同时也是中国在东北亚地区的重要合作伙伴。2022年,韩国超过日本成为中国第四大贸易国,位列东盟、欧盟和美国之后。自1992年中韩建交以来,双边贸易和投资等经贸合作和人员往来日趋紧密。韩国是中国电子和机械产业链重要中间品的供应地,也是中国制造业外资的重要来源地,中国是韩国商品和服务出口的主要目的地。但“萨德事件”导致中韩关系陷入危机,引发中韩经贸合作的政治基础有所松动。此后,很多韩国企业纷纷结束在华投资转移至本国或其他东南亚国家或地区,在中美关税战的刺激下,韩国企业产业转移有所加速,如目前三星已将绝大部分面向欧美市场的制造产能从中国转移到越南和印度等地。尹锡悦在参选总统的演说中就表示出对华的强硬态度,虽然他上台后组成的新政府仍强调中韩经贸合作的重要性,但他参与美国“印太经济框架”、出席北约峰会、推出韩版“印太战略”、改善日韩关系和应邀参加日本G7峰会等实际行动表明,韩国新政府战略上明确奉行亲美政策。在赴日之前,韩国总统罕见对台海问题表态并引发中韩双方大使级争端,中韩两国关系政治化倾向加剧同样进一步削弱双边民意基础。韩国的战略性转向促成了美日韩领导人戴维营会晤,并联合发布《美日韩联合声明》等。此外,印度是美国主导的“印太战略”中的重要一环,是“四方安全对话”(Quad)机制的成员。1962年,中印曾因边境领土争议爆发短暂热战,并以中方主动撤回收场。此后,虽双方建立起沟通机制,但因修路及巡逻而引起的边境对峙和冲突时有发生。2020年夏,中印边境再发事端导致双边关系急转直下并波及双边经贸合作,印度封禁了多达三百余款中国应用APP,中国几家大型科技企业在印度的投资陷入停滞。印度爆发全国性的抵制中国货运动,对中国进口商品采取延缓、推迟通关和扣押等报复措施。2023年6月,印度指控中国某公司非法向海外转移资金,并违背国际商业惯例和WTO基本原则要求中国手机企业任命印籍高管。根据联合国数据,2023年4月底,印度总人口超过中国成为世界第一人口大国。强大的内需市场和“印度制造”战略使印度成为挑战中国全球制造中心的潜在对手。中印关系出现裂缝无疑为美国拉拢印度围堵中国创造了契机。2023年,印度总理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并受到拜登政府盛大欢迎,美印发表了一份类似于“二战”后的美日声明,志在改变亚太均势的涵盖广泛、全面深入、针对性极强的《美国和印度联合声明》。另外,中美博弈直接影响了中国与东亚南一些国家的关系,导致南海议题升温,时刻对中国周边关系的稳定构成威胁。长期以来,中国与菲律宾、越南、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和斐济等东南亚国家之间存在南海岛屿争端,虽然这些国家与中国的经贸往来比美国更为直接,在中美大国发生争端时也强调不选边站,其本质是不希望看到中国在东南亚地区太过强势,并在暗地里仍期待美国的平衡力量。综上,中国两组重要的对外关系均因中美关系恶化而被波及。欧美市场和周边产业链是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形成循环难以替代的左右两翼,中国与欧美国家和周边国家的关系是中国对外开放战略必须重点关注和谨慎对待的两个关系,在中国整体外交关系格局中占据关键地位。然而,当前这两大关系的理性处理遭遇很大困境,从而为中国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带来较大不确定性。

## (二) 正确评估当前经济全球化态势及走向

当前,国内比较流行的一个看法是,经济全球化面临退潮或逆流,个别国家走在保护主义回头路上。如何正确评价当前经济全球化态势及走向,直接影响中国对外开放战略的制定与实施。我们的一个基本判断是,当前世界进入了慢全球化时代。始于20世纪90年代并持续了约二三十

年的超级全球化不可能永远持续下去，这当中既有科技周期下行和制度红利耗尽等深层次客观原因，也有主观原因。从经济规律来看，国际分工和全球价值链碎片化存在一个自然极限，再分工下去，或不可行，或反而导致成本剧增。集装箱革命、互联网技术的发展与应用和多边主义机制对经济全球化的边际促进效应日趋减弱。在超级全球化的时代，超国家组织的作用得以充分发挥，然而超级全球化并未缩小南北收入差异，而且导致一些国家内部制造产业萎缩和工人失业等问题。虽然全球化对世界范围内减贫作出巨大贡献，但客观上也是导致收入差距扩大的重要因素<sup>[13]</sup>。在此局面下，强势政府回归和内向倾向加剧使经济民族主义意识增强，叠加在一起导致全球化的民意基础受到削弱。但是，从人类发展基本趋势来看，世界不可能退回到相互隔绝孤立的状态，经济全球化远未终结。个别西方发达国家的“逆全球化”行为不具有普遍意义。美国主要是想根据自身利益诉求重新定义“全球化”，重构符合自身利益的全球贸易治理体系<sup>[14]</sup>。金碚<sup>[15]</sup>也认为，美国所采取的种种貌似逆全球化的举措，其实质是希望修塑或重塑经济全球化的秩序规则，以有利于维护其在经济全球化中的利益优先格局和既有的霸主地位。如图2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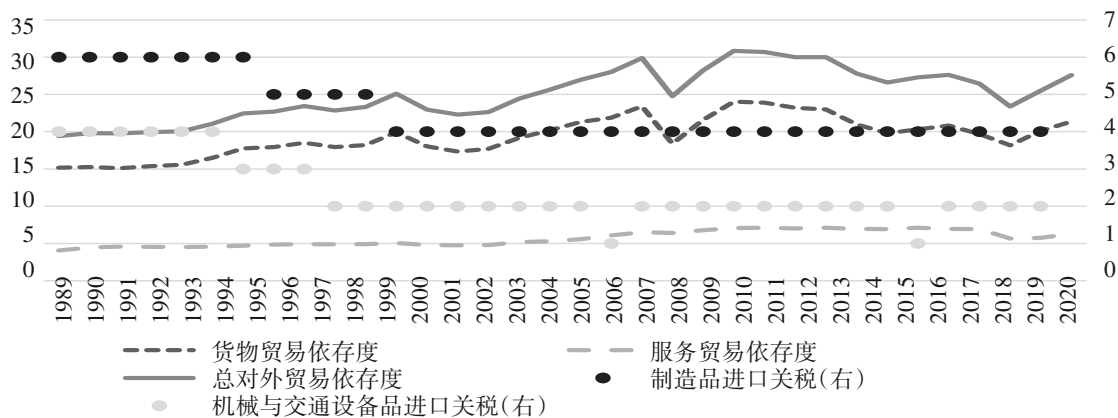


图2 美国对外贸易依存度和制造业关税发展趋势（单位：%）

由图2可知，1990—2008年，美国对外贸易依存度呈持续上升态势，制造业进口关税呈持续下降趋势。受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2009年，美国货物贸易依存度下降，但次年即反弹，并于2011年达到历史高点（24%）。2020年，新冠疫情导致美国货物贸易依存度下降幅度超过全球金融危机时期，但此后逐渐恢复上升。2022年，美国货物贸易依存度上升至21%，仍处于一个相对高位水平。2008年之前，美国服务贸易依存度一直保持小幅稳步增长，受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较小，在2014年达到最高点。2020年，受新冠疫情影响，美国服务贸易依存度有所下降，此后呈上升态势。即使经历新冠疫情，2022年，美国货物贸易依存度和服务贸易依存度均高于1970年以来的绝大多数年份。客观上，美国对外贸易依存度走势与其部分政客的反全球化倾向背道而驰。《世界投资报告2023》数据显示，2022年，美国是全球最大的FDI流入国和流出国，这说明外资审查加严并未阻拦其整体双向投资流动。从全球利益角度来讲，美国很难脱离全球化，也不会拱手让出全球经济治理权，而是想重构一个更有利于自己的新全球化，从其正式官方文件中也找不到任何有关反全球化的宣言或声明。美国对WTO表现出不满或抱怨由来已久，并最终导致“皇冠上的明珠”争端解决机制瘫痪，特朗普甚至扬言退出WTO，这本质上是一种要价策略。在可预见的未来，美国退出WTO的可能性微乎其微。虽然全球金融危机以来美国不断推出内向政策，如再工业化、制造业回流和产业补贴等，但将美国局部调整全球化战略看作其彻底摒弃全球化显然也是有失理性的。美国经济绝没有虚弱到必须靠贸易保护措施才能拥有国际竞争力的地步<sup>[15]</sup>。近年来，美国针对中国的“脱钩断链”“小院高墙”等做法是美国对华总体“遏



压”战略的意志体现和组成部分,具有很强的指向性,美国并未对中国之外的其他国家采取类似的高压遏制政策。美国的反全球化是意图撇开中国的全球化,也就是说,本质上,美国反的是有中国在内的全球化,这可从奥巴马政府推动TPP及近期拜登政府启动“印太经济框架”中看出,因而其他国家可能对美国的反全球化行为持不同于中国的立场。因此,即使在大国激烈战略竞争背景下,也不应夸大经济全球化的逆转程度,否则可能会扰乱融入全球化的节奏,而要坚持“两点论”。一方面,经济全球化确实慢下来了;另一方面,慢经济全球化也是处在高水平的全球化,不能因为它慢下来就轻视它甚至陷入无用论。《2023年世界贸易报告》指出,逆全球化或去全球化并没有真正得到实际数据的支持。2022年,世界货物贸易依存度仍高达50.54%,是全球金融危机以来的最高点,是自1960年开始有统计数据以来仅次于2008年的第二高点。因此,不管国际风云如何变幻,积极融入经济全球化仍是中国不可动摇的长期战略。

### (三) 积极探究发展中国家身份争议的解决之道

中国的发展中国家身份问题是中国式现代化加速推进过程中无法回避的一个重大问题。目前,相关媒体报道,美国拟出台否定中国为发展中国家身份的法案,称在凡有美国参加的国际组织都寻求取消中国的发展中国家待遇和利益。德国首份《中国战略》也罕见地提出对中国发展中国家身份的关切。美国对中国发展中国家身份的不满由来已久,凸显美国习以为常的贸易单边主义倾向和思维,但也引起部分专业人士的理性观察,即中国在国际多边谈判中的发展中国家身份的调整是否具有现实紧迫性。习近平总书记在《关于〈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的说明》中指出,“我国仍然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要“维护发展中国家共同利益。”<sup>[4]</sup><sup>61</sup>当前关于何为发展中国家,国内外学术界尚未达成共识。相关发展中国家的不同定义是根据不同的标准制定的,在有些场合使用经济标准,在其他情况下,除经济标准外,还使用预期寿命和教育水平等社会标准来确定一个国家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WTO没有明确规定什么是发展中国家,什么是发达国家,而是采取加入时自我声明的办法,也没有规定成员以发展中国家身份“毕业”的相关条款。根据联合国《世界经济形势与展望2023》,世界上共有37个发达国家,中国被列为发展中国家。该报告指出,这一分类主要依据基本经济国情,但并未列出详细划分标准。从客观性和完备性角度来看,定义发达国家或发展中国家身份的最佳办法是同时使用经济标准和社会标准。联合国另一项研究将这两种衡量标准结合起来,设定人类发展指数(Human Development Index, HDI),该指数主要由三个指标组成,分别为寿命指标、教育指标和GNI指标,根据这三个指标标准化分值的简单平均总和将国家分为四组,小于0.5500为低,0.5500—0.6990为中,0.7000—0.7999为高,大于0.8000为很高。大多数发达国家的HDI分值大于0.8000。2021年,中国的HDI为0.7680,低于发达标准,高于世界平均值0.7320。另外,从城市化指标来看,2022年,中国常住人口城市化率为65.22%<sup>[16]</sup>,如果仅算户籍人口的城市化率,仅为45.40%(2020年底),<sup>①</sup>后者远低于发达国家80%左右的平均水平。从经济发展层次和质量来看,中国经济总体上仍主要依赖中低端制造业,服务业发展相对落后,仍处于发展中国家层次,若要成为发达国家,必须拥有高端制造业和服务业,依赖消费而非投资。按照世界银行收入标准分类,中国至今仍未达到高收入国家水平。根据以上分析可以得出,中国目前仍属于发展中国家,而且可能还会持续相当长的时期,尤其在经济社会发展质量方面,中国离发达国家标准还存在很大距离。但中国连续多年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若按购买力平价计算,2014年中国GDP规模就已超过美国,而且在航空航天、高铁装备、超级计算机和数字经济等方面甚至超过不少发达国家,世界500强和高科技独角兽企业数量仅次于美国。关于中国何时从发展中国家身份“毕业”仍是一个未知数,这取决于

① 数据来源: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十四五”新型城镇化实施方案[EB/OL].(2022-07-28)[2023-07-20].https://www.ndrc.gov.cn/fggz/fzlggh/gjjzqgh/202207/t20220728\_1332050\_ext.html.

中国是否会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和社会转型能否成功等更为深层次的复杂因素。当务之急是中国针对美国的说辞应拿出应对策略。因此，中国也应仔细衡量发展中国家身份到底能给我们带来什么好处，精准评估丢失这一身份可能造成的潜在危害，从而在国际经贸谈判时适度采取前瞻性路线安排，或采取“化整为零”策略，在必须坚守的领域绝不放弃，在其他领域可以适当展现灵活性，从而适当减轻国际压力，争取国际道义支持。

#### （四）全面分析当前中国经济外向度和未来水平

一个国家经济究竟应持有多大的外向度并无统一标准。通常来讲，由于本国市场狭小，小型经济体和自由港等的经济外向度相对较高；由于国内市场足够大，大型经济体能够实现内部循环，因而经济外向度相对偏低。钱纳里<sup>[17]</sup>指出，大国发展模式主要的可区别特征是较低的国际贸易水平，国家越大，且政策的内向性越强，它的经济就越趋于封闭。2020年，面对国内外形势变化，党中央提出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在此背景下，有些文献援引美国和日本货物贸易依存度数据，2022年，美国为21.57%，2021年，日本为30.47%，而2022年，中国为35.13%，从而得出中国经济外向度偏高的结论。对此，应作全方面考察。首先，若将样本国换为德国，按此逻辑则很容易得到中国经济外向度偏低的结论。德国是世界公认的经济强国和贸易强国，2022年，其货物贸易依存度高达79.24%，是中国的两倍多。其次，必须注意到，对外贸易依存度是一个属地概念，美国和日本这两个国家在海外的资本和跨国公司创造的出口并不计算在内。波特<sup>[18]</sup>曾指出，由于欧美发达国家企业在海外开展大量投资活动，因而其产业的国际市场地位很难从单纯的进出口数据中看出。既然如此，对外贸易依存度也就不能真实客观地反映他们的经济外向度或外循环规模。再次，从同水平横向比较来看，如图3所示，2019年中国人均GDP刚迈进1万美元大关，而G7成员中的英国、法国、加拿大、德国、意大利及相对欠发达的西班牙和韩国，其外贸依存度在人均GDP达1万美元之际均高于中国。按此来看，当前中国对外贸易依存度并不高。另外，在人均GDP从1万美元上升至两万美元的过程中，仅英国和日本出现对外贸易依存度下降的情形，而其他国家的外贸依存度或持平或呈现不同程度的提高。值得注意的是，西班牙和韩国这两个后发国家在人均GDP迈向两万美元台阶的过程中，其外贸依存度呈现显著上升的趋势。此外，这些国家人均GDP在迈过1万美元和两万美元大关时，经济全球化水平不可与当今相比，在相对低水平经济全球化时代仍能取得如此对外贸易依存度，这说明其经济外向度普遍较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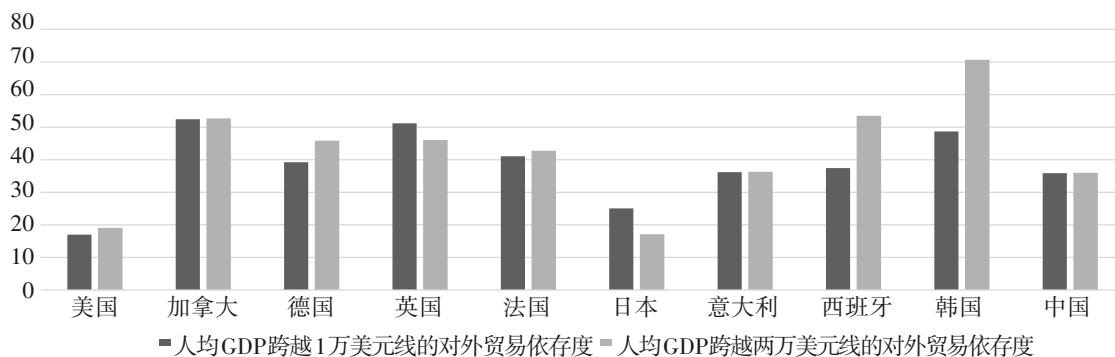


图3 世界部分主要国家对外贸易依存度变化趋势（单位：%）

注：此处对外贸易依存度包括货物和服务贸易依存度；中国人均GDP达两万美元大关时的对外贸易依存度援引了相关研究成果。唐遥<sup>[19]</sup>指出，到2035年，中国外贸依存度将在36%左右，和当前的水平相似。但必须指出，鉴于世界经济形势的复杂多变，很难精准预测未来中国人均GDP达到两万美元时的外贸依存度，由于中国“世界工厂”地位的稳固，在政策不发生重大变化的前提下，维持这一水平的外贸依存度是可能的，这也是释放国内庞大制造产能所需的。数据来自世界银行。

因此,在全球化不断深化的时代,对于正处于追赶或起飞阶段的国家而言,具有一个较高的外贸依存度或经济外向度仍是明智之举。

## 五、中国式现代化背景下高水平对外开放的战略抉择

过去45年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取得的成就主要得益于通过自身改革积极融入经济全球化浪潮,未来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也必然要在开放状态下通过高质量发展来实现。实践充分证明,开放竞争是中国经济发展壮大有效途径,是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必由之路<sup>[20]</sup>。《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指出,“党中央深刻认识到,开放带来进步,封闭必然落后;我国发展要赢得优势、赢得主动、赢得未来,必须顺应经济全球化,依托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实行更加积极主动的开放战略。”因此,对中国而言,构建自然和谐的开放型国际关系,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推动高水平对外开放的战略选择。

### (一) 以史为鉴,合理把握自立自强与对外开放的关系

习近平在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研讨班开班式上发表重要讲话中强调,推进中国式现代化需要处理好若干重大关系,其中第六条就是自立自强与对外开放的关系。中美大国竞争暴露出来的技术“卡脖子”困境说明科技自立自强的重要性。无论何时,任何一个国家的高质量发展最终需要自身的努力,但这绝不意味着可以闭门造车。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强调自立自强,绝不是闭关锁国,而是更好联通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sup>[3]</sup>。在当今深度全球化的时代,一个独立于世界经济主流体系之外的国家,是很难实现经济增长、提高经济和产业竞争力的。经济发展依赖供需两端共同发力,脱离世界供求网络必将付出巨大代价。蔡昉<sup>[21]</sup>指出,在“双循环”背景下,外需应该而且的确是重要的需求因素,应充分利用自身比较优势,同时利用中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关键位置、广泛连接性和充分韧性,牢牢地嵌入全球分工体系,坚定地避免与全球分工体系脱钩。

从国际经验来看,“二战”后,奉行“出口导向”的东亚模式展现出巨大的经济活力,其经济绩效要远高于追求“进口替代”的相对保守的拉美模式。当然,对外开放并非一“开”就灵,对外开放究竟给一个国家是带来发展和繁荣,还是带来损失和冲突,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这个国家的政策应对及调整。当今世界,很多国家有效处理平衡对外开放与自力更生的关系的经验值得借鉴,其做法值得效仿。如德国,一方面,其经济外向度水平相当高,2022年的货物贸易依存度和服务贸易依存度分别高达79.24%和21.82%;<sup>①</sup>另一方面,其强大的自主内生创新力托起了众多有世界级品牌,尤其是在制造领域,“德国制造”是全球公认的高品质代名词。对外开放从来没有成为德国进行自主创新、提升科技水平和产业竞争力的障碍。另外,实践经验表明,温室里的花朵经不起风吹雨打。当前,中国的产业,除极少数之外,缺的不是保护而是竞争,在不少领域甚至还存在过度保护的现象,中国经济部门中,不平衡、不充分最为集中的领域也是竞争最为缺乏的领域。日本在“二战”后之所以能形成强大的产业竞争力,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在于政府有意创造国内激烈的竞争环境,从而对企业施加巨大压力。由于日本通产省的产业政策主要针对的是行业而不是企业,所以,即使在重点产业领域,企业之间仍处于激烈的竞争之中<sup>[22]</sup>。而且,在日益强调对等开放的国际环境下,对外开放也是保证中国大批有实力的企业“走出去”抢占国际市场的先决影响因素。《世界投资报告2023》数据显示,中国是仅次于美国和日本的世界第三大对外投资国,具有庞大的海外投资潜在利益。然而,未来中国企业进入他国市场的广度和深度,尤其对欧美地区的投资,日益取决于中国向这些投资目的地国家资本市场开放的程度。

<sup>①</sup> 数据来源:世界银行世界发展指标数据库。

## （二）以建设高标准市场经济为导向，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市场经济是现代经济文明的标志和产物。当今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都实行了市场经济，多边及双边国际经贸规则也以市场经济理论和原则为导向。

中国能以非市场经济身份加入WTO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中国承诺转向市场经济体制，并在实际中果断实施了大量市场化改革，从而赢得其他国家的认可。经过45年的改革开放，相对容易开放的领域都实施了市场经济体制，未来对外开放更多地取决于能否大胆推进改革。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开放度的大小依赖于改革的成效。如何更好地构建市场经济秩序，更顺畅地与经济全球化相融合，是中国经济改革和发展所要解决的一个最重要的和最根本的问题<sup>[15]</sup>。市场化改革不到位不彻底是当前阻碍中国高水平对外开放、构建对外开放新格局和深度融入全球经济体系的重要因素，其中，市场化改革最为滞后的是行政性垄断国有企业所占据的竞争领域。而且，国有企业规制已成为中国加入CPTPP无法回避且难以获得例外处理的棘手问题。此外，政府自身改革是与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成效休戚与共的基础性改革。政府职能不转变，便无法准确界定政府和市场的边界，因而也就无法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也无法有效推进服务业扩大开放，无法解除政府过度补贴、土地流转、数据传输和人口流动等要素市场化配置障碍。2020年4月，《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构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的意见》提出，深化土地、劳动力、资本、技术和数据五个要素的市场化配置改革，加快要素价格市场化改革，健全要素市场运行机制，促进要素自主有序流动，提高要素配置效率。2020年5月，《中共中央 国务院发布关于新时代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意见》指出，“坚定不移深化市场化改革，扩大高水平开放，不断在经济体制关键性基础性重大改革上突破创新。”夯实市场经济基础性制度，创新政府管理和服务方式，完善宏观经济治理体制。此外，灵敏高效的要素市场化配置是高标准建设统一、开放、竞争、有序市场经济体制的内在要求，是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和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重要内容。2022年12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扩大内需战略规划纲要（2022—2035年）》，将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取得重大进展确定为“十四五”时期实施扩大内需战略的主要目标之一，并就提升要素市场化配置水平作出进一步部署，对于提升资源环境要素优化配置和节约集约安全利用水平具有重要作用。

## （三）以高标准国际经贸规则为尺度，大力推动高水平制度型开放

党的十九大以来，中国对外开放进入制度型开放时代。2018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适应新形势、把握新特点，推动由商品和要素流动型开放向规则等制度型开放转变。2019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出，继续推动商品和要素流动型开放，更加注重规则等制度型开放。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推动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型开放。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稳步扩大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型开放。”<sup>[4]</sup><sup>32</sup>然而，与高质量发展需求相比，当前中国制度型开放还有很大提升的空间。为此，应积极对接新一轮国际经贸规则发展要求，加强自身制度适应性调整。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向2023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全球服务贸易峰会发表视频致辞中提出，“在国家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示范区以及有条件的自由贸易试验区和自由贸易港，率先对接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自从世界经济一体化以来，国际经贸规则一直处于不断演变之中，随着时间和实践的推进持续更新升级。中国的对外开放本质上就是不断适应国际经贸规则的过程。随着国际开放标准的不断提高，持续升级的国际经贸规则势必对国内规则改革提出更高要求，各国需持续地在国家经济主权与经济全球化博弈之间找到利益平衡点，稍作迟缓则有可能引发国内外制度摩擦进而影响经济全球化红利的获取，不利于经济增长。当前国际经贸规则不断向边境后国内经济管理规制推进，涉及服务贸易、投资、电子商务、竞争政策、国有企业和指定垄断、劳工、环境、中小企业、透明度与反腐败、监管一致性等，其目的在于消除自由贸易的内部体制障碍，这在很大程度上代表了新型经济全球化规则进一步发展的方向，基本符合促进市

场经济和生产力发展的方向。这些业已国际化的经贸规则之所以国际通行,主要是因为它们本身就意味着先进性、科学性、合理性,是经历了长期实践检验提炼而成的。就有意融入经济全球化的国家而言,采取积极适应的心态是一种理性选择,一味抵制只能使自己与高标准经济全球化越来越远。另外,需要指出的是,积极推进制度型开放不应忽视商品和要素的流动型开放,制度型开放有利于促进商品和要素的流动型开放,但不可能形成替代,经济全球化的立足点仍在于商品和要素的自由便利流动,因而制度型开放要以服务商品和要素流动型开放为目的,不应顾此失彼。此外,推进高水平制度型开放并不意味着被动适应国际经贸规则,而是要参与到国际经贸规则的协调制定中去。基于中国经济规模和海外布局需求,中国也应积极扩大国际经贸规则的谈判与制定的话语权。但在共同的“游戏规则”的商定过程中,应讲求方式策略,在各方争取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规则谈判中,懂得坚持与妥协。若各方都“以我为主”而不顾及他人的诉求,要么相互脱钩,要么强权盛行,这都不符合中国发展的利益。因此,在需要共同规则的多边领域,慎提“以我为主”,注意利益平衡<sup>[23]</sup>。当前最为急需的是要不断提高参与国际经贸规则制定的综合能力,坚持全球化方向并提出具有前瞻性且能获得广泛认同的规则议题,在国际前沿经贸规则议定过程中,在兼顾自身利益的同时更多地发挥积极作用。制度型开放内含着护航高水平开放行稳致远的安全制度建设,因而可以有效统筹兼顾开放与安全,实现开放能力与安全水平的互促提升。

#### 参考文献:

- [1] 杨雪冬.内外互动、主体选择与中国道路的百年探索[J].东北亚论坛,2021,30(4):3-23.
- [2] 赵振英.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对外开放:中国式现代化之路[J].新视野,1999(5):2-6.
- [3] 杨依希.习近平会见新西兰总理希普金斯[N].人民日报,2023-06-09(1).
- [4] 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
- [5]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文集:第7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43.
- [6]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刘少奇论新中国经济建设[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64.
- [7] 陈云.陈云文选:第2卷[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209.
- [8]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国际合作中心对外开放课题组.中国对外开放40年[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8:323.
- [9] 朱福林.高质量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研究[J].理论视野,2023(5):56-63.
- [10] 张幼文.重新定位对外开放——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关系的变化趋势[J].探索与争鸣,2020(7):32-40.
- [11] 刘建丽.新中国利用外资70年:历程、效应与主要经验[J].管理世界,2019,35(11):19-37.
- [12] 吴敬琏.中国经济改革进程[M].2版.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23:171.
- [13] 马克·莱文森.全球化简史[M].方宇,译.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2022:176.
- [14] 崔鑫生.“入世”20年:中国与世界互动的回顾与展望[J].人民论坛,2021(20):106-109.
- [15] 金碚.世界大变局下中国改革开放新格局[J].经济体制改革,2020(5):5-10.
- [16] 王萍萍.人口总量略有下降 城镇化水平继续提高[EB/OL].(2023-01-18)[2023-07-10].[http://www.stats.gov.cn/xxgk/jd/sjjd2020/202301/t20230118\\_1892285.html](http://www.stats.gov.cn/xxgk/jd/sjjd2020/202301/t20230118_1892285.html).
- [17] 霍利斯·钱纳里.结构变化与发展政策[M].朱东海,黄钟,译.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1991:87.
- [18] 迈克尔·波特.国家竞争优势:下[M].李明轩,邱如美,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2:4.
- [19] 唐遥.优化贸易和直接投资的结构,实现国际经济合作的多赢[EB/OL].(2022-12-19)[2023-07-30].<https://www.nbd.com.cn/articles/2022-12-19/2600661.html>.
- [20] 中国开放之门越开越大[N].人民日报,2019-04-27(3).
- [21] 蔡昉.中国经济如何实现自身的潜在增长[M]//陈元,黄益平.双循环:中国经济新格局.北京:人民日报出版社,2021:164.
- [22] 张维迎.市场与政府:中国改革的核心博弈[M].西安:西北大学出版社,2014:275.
- [23] 叶辅靖.我国高水平开放若干重要问题辨析[J].开放导报,2022(2):7-12.

## Opening up With Chinese Modernization: Internal Logic, Key Issues and Strategic Choice

ZHU Fu-lin

(Foreign Investment Research Institute, Chinese Academy of International Trade and Economic Cooperation of  
the Ministry of Commerce of China, Beijing 100710, China)

**Summary:** Report to the 20th 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made a theoretical plan and overall deployment for Chinese modernization, and pointed out that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is the primary task for building a modern socialist country in an all-round way. In the context of deep integration of Chinese economy into economic globalization, a necessary condition for achieving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is high-standard opening up. The 45 years of development practice since the reform and opening up has shown that opening up is an important factor driving the continuous progress of China's socialist modernization construction. However, the relevant discussions in existing literature on analyzing the logical relation between opening up and Chinese modernization, and their internal mechanism, and how to promote high-standard opening up in the new era still need to be enriched. Therefore, this paper discusses this issue in detail, finds the rules through sorting out facts, and provides experience and reference for high-standard opening up under the new journey of Chinese modernization.

This paper first introduces the issue from the background, expounds the inevitability and significance of promoting high-standard opening up in the context of Chinese modernization, expounds the inevitability of China's opening up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conomic globalization, and points out that opening up has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in China's reform and opening up in the past 45 years. Based on the current international situation, it further indicates the necessity and greater significance of continued promotion of the basic policy of opening up. This paper puts forward that there is a very close interaction between opening up and China modernization, discusses the interactive development between opening up and Chinese modernization in stages, summarizes the interactive logic, specific path, and development performance in the way of combining policy and practice, and analyzes the political economy mechanism between opening up and Chinese modernization. This article also analyzes several key issues in further promotion of high-standard opening up, providing valuable insights for further exploration of related issues. Finally, policy suggestions are proposed from three aspects, that is, grasping the dialectical relation between self-reliance and opening up, further deepening the market-oriented reform of the economic system, and promoting a higher-standard institutional openness.

Different from existing studies, this paper, based on the internal connectivity between opening up and Chinese modernization, points out the internal logic, mechanism and principle of mutual promotion and their actual effects. It also points out the major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problems involved in China's further opening up and their solutions. It analyzes the interaction process between the two to provide theoretical support for high-standard opening up.

**Key words:** opening up; Chinese modernization; high-standard opening up; economic globalization

(责任编辑: 刘 艳)

[DOI]10.19654/j.cnki.cjwtyj.2023.12.001

[引用格式]朱福林. 对外开放与中国式现代化——内在逻辑、重点议题及战略抉择[J]. 财经问题研究, 2023(12): 3-16.